

北宋士人交游录

方健 著



北宋士人交游录

方健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士人交游录/方健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458-0788-2

I. ①北… II. ①方…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333 号

责任编辑 马丽娟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北宋士人交游录
方 健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mm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700,000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788-2/D·24
定 价 88.00 元

目 录

序章 “举世重交游”的时代	1
一 宋人重交游的社会氛围	2
二 行会结社与宋人交游	5
三 宋代士族主要交游群体	17
(一) 逸老养贤:宋代退休官员的交游	18
(二) 同年同学及师生的交游	35
(三) 同官僚友间的交游	52
(四) 方外交游	91
四 交游礼仪与方式	105
(一) 相见礼仪	105
(二) 待客礼仪	108
(三) 馈赠礼仪	113
(四) 宋人交游方式:以书信为例	116
(五) 宋人贺吊礼仪	123
(六) 交游称谓	128
五 交游之道及其禁忌	140
(一) 惟德是依 因心而友	141
(二) 道不同不相与谋	145
(三) 淡交如水 三益之友	158
(四) 交游禁忌	163
第一章 宋初交游圈:以王禹偁为中心的考察	190
一 行卷与延誉:宋初逐渐淡化的官场潜规则	191
二 王禹偁交游考略	200
(一) 师长:“品题名姓”,“陶铸官资”	201
(二) 僚友:“一言得意便定交”	211

(三) 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与晚辈后学的交游	248
三 净行社:开宋代文学结社之先河	261
第二章 范仲淹的交游之道:“情深结绶”,“见贤必亲”	280
一 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滕宗谅	280
(一) “范吕解仇”说的由来和考辨	281
(二) 梅范交恶考略	285
(三)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292
二 范仲淹与韩琦	295
(一) 范韩在西帅征程中的生死情谊	296
(二) 范韩交游书信考略	299
(三) 忘年之交:“金兰之契”,古今罕见	312
三 范仲淹交游研究:以其书信为例	316
附录:包拯交游考略	354
(一) 文彦博:世交·同年·姻亲	357
(二) 吴奎:同年·僚友·挚交	360
(三) 吴中复:铁面御史·交政·知音	361
(四) 包拯与“江东三虎”:杨纘、王鼎、王绰	363
(五) 欧阳修:“四真”·诤友·同僚	367
(六) 包拯与刘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69
(七) 张田:门生·姻亲·知音	371
第三章 “丁年结客盛游从”:王安石交游考略	377
一 “临风想望”:王安石与欧阳修	378
(一) 交游之初:“吏部文章二百年”,“终自何敢望韩公”	379
(二) 王安石欧阳修昭君诗唱酬的再探索	390
(三) “临风想望”:“心之向慕而瞻依”	398
二 心照神契 莫逆之交:王安石与曾巩	405
(一) 熙宁元年(1068)前二人之交游概况	405
(二) 熙宁元丰期间二人之交游	418
(三) 分歧的由来与发展	425

三	王安石与沈括	430
	(一) 王安石罢相前的沈王关系	430
	(二) 王安石退闲后的沈王关系	437
四	王安石与三苏	441
	(一) 《辨奸论》作者之谜新证	442
	(二) 王安石与苏轼、苏辙	459
第四章	苏轼交游考略:以“乌台诗案”为例	483
一	乌台诗案概述	484
	(一) 乌台诗案的缘起及其性质	485
	(二) 乌台诗案的进程	494
二	苏轼的举主:交游之一	497
三	“殃及池鱼”:交游之二	513
	(一) 受牵连而同被责罚的交游	514
	(二) 未受责罚的涉案交游	573
四	交游之三:仗义执言,救援苏轼诸公	612
	(一) 名公重臣对苏轼的救援	613
	(二) 四十年如一日:章惇、苏轼交谊历久而弥深	615
后记		633

序章 “举世重交游”的时代

五代后周世宗、宋太祖两朝宰相范质(911~964),在《戒儿侄》诗中有一名言“举世重交游”^①,传颂已久,不失为对两宋时代一种社会现象确切而精辟的概括。

士之交游,先秦已很普遍。西汉翟公之论,颇为古人所重。翟公,汉下邳(治今陕西渭南临渭区下吉镇东南)人。初为廷尉,宾客盈门;及废,门可罗雀。复职后,宾客欲往谒,乃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②不失为警世之论。两汉、晋唐以降,士大夫之交游,仪态万方。至两宋,进入了“举世重交游”的时代。士之交游,成为最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是衡量社会风尚、人们道德水准的风向标。在宋人交游中,也产生了无数诗词文赋的传世杰作,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之一。本书拟从这几方面进行探索。

宋人交游,是一种极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堪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奇不存,而且涉及各阶层、各方面人群。本书所论述者主要为士族知识分子及释道、隐士等,这已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宋人交游极为广泛,以各种社会关系而结成不同的交游圈。如同学、同年、师生、同官、僚属、交政、乡贤、世交、姻亲,均是结成交游的社会基础。同年之谊,僚友之情,交承之雅,乡曲之好,姻亲之契,朋党之旧,方外之缘,逸老之会,则成为宋人交游的主要方式。宋人在交游中,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真挚动人故事,也不乏势利之交以德报怨、落井下石、鲜廉寡耻的实录。从这一角度而言,宋人交游,又是士人心灵的广角镜,一定程度上可折射出其人格和道德的高下优劣。宋人交游,还与朋党政争纠结交织,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似也不能单从道德层面作出是非评判。

① 吕祖谦《皇朝文鉴》卷14《五言古诗》。

② 《史记》卷120《汲郑列传》“太史公曰”。

一 宋人重交游的社会氛围

宋人交游,是一种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蛛连网结,盘根错节。宋人格外重视交游,是当时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客观反映。宋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改革与动荡的年代,又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举世重交游”,成为宋人在这样一个时代赖以立身进取的必然选择,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盛行的“关系学”,从某种程度而言,即继承了宋人“举世重交游”的历史遗产。

近年来,成为学界热点的“唐宋变革”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教授首倡这一学说近百年以后,海内外学者进行了充分的探索与论证。一般认为,这一观点已为中外学界所广泛认可或接受。始自中唐,迄于宋代(其中又有宋初、北宋、南宋等不同说法)——即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制、社会、思想等领域均先后产生巨大的转变,较之中唐以前,判然有别。^①仅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论,赵宋王朝与前朝的不同之处主要有列几方面:

首先,宋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质之一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②。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高级官员十分宽厚和包容,相当信任与信赖。相对于隋唐时期的贵族门阀制度,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③,乃至秦汉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如果说唐以前是贵族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的话,宋代基本上是皇权制约下的文官政治体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培养与选拔人才的机制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北宋经景祐、庆历、熙丰三次办学高潮后,州县多已立学。北宋中期后实行太学三舍升迁制,更成为一种导向。两宋之际,太学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和主张抗金的爱国运动策源地。南宋初学生领袖陈东(1086~1127)、欧阳澈(1091~1127)因主张抗金,干预时政,惨遭宋高宗杀害。至迟在南宋中期,官私学之兴办已遍及全国各地,各地书院乃至乡塾村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出身孤寒的子弟经过寒窗苦读,通过科举,步入仕途。重视教育,注重文化,成为赵宋的国策之一,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促进了宋学的极盛。

① 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序论,页1~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②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1071),三朝元老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页5370,中华书局,1986)较早概括为这一命题,见张其凡《宋初政治探析》,页62~67,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③ 海内史学界通常名之曰“九品中正制”,此采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名著《九品官人法研究》(原刊《宫崎市定全集》卷6,岩波书店,1992;韩昇等译中文本,中华书局,2008)之说。

科举制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两宋凡320年,开科118次,平均不到三年(2.7)一次;诸科登科人数约10万之众,平均每榜取士847人。^①宋代贡举考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各地州郡发解试及礼部贡试举子的人数虽无确切统计,但从零星史料推测,应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人群。^②无论是发解试(合格者称乡贡进士,亦简称进士)还是礼部贡试,都促进了各地举子的广泛交流,使之成为交游最广的群体。同科登科者,更被称为“同年”,其中的进士科成为中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值得一提的是:经王安石当政时的贡举改革,进士一科就更为引人注目。同年,就更是交游群体中最为活跃的人群,留下了无数的交游诗文及大量佳话。流风余韵,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在太学、州县学乃至书院及乡塾村校就读的生徒及教授、师长们也是一个数量极为庞大的交游群体。尊师重道,成为宋人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其次,在宋代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中就职的官员也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宋代官员,就其入仕的出身或来源区分,大致有五种途径:一为科举,二为恩荫,三为吏人出职,四为进纳补官,五为军功授官(多为右选武职)。据嘉定六年(1213)的不完全统计,五种入仕途径分别为:科举10125人,占26.1%;恩荫22116人,占56.9%;吏人出职1847人,占4.7%;进纳补官940人,占2.4%;军功授官2891人,占7.4%;其他958人,占2.5%。合计为38870人。^③这也许是颇具代表性的数据,其中恩荫占半数以上,但多为中低级官员;科举出身的虽仅占四分之一略多,但日后所任多为权重事专的中高级官员,且多在要害部门。可以说,这部分人是宋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决策及实施者,在宋代官僚政治体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

① 据龚延明《宋登科记考》卷首叙例之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张希清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三卷《宋代卷》叙录(页14,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称:进士科约4.3万人,诸科约1.7万人,合计约6万人,平均每科508人;另有特奏名登科者约5万人,合计为11万人。稍有不同。

② 发解试与礼部贡试的人数史料中虽有记载,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额较大。徽宗时,州县学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主要原因为诏罢州郡发解试与礼部贡试,天下取士全由学校升贡。大观二年(1108),全国生徒达11万余人;次年更高达16.76万人。如果将北宋中期以后,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举子估计为10万人的话,相信不会离实际过远。治平三年(1066),规定礼部奏名进士各以300人为额。如以今幸存的《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验证,登科者则恰为601人(第五甲注213人,实际列名189人,第199人以下凡24人已残缺),似非偶然巧合。《绍兴十八年(1148)同年小录》虽仅331人,尚有特奏名457人。如以录取率10%推计,则应礼部省试者应为每届6000人左右。据同上张希清《文献集成》(页6、13)数据匡算。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下简称《杂记》)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页757~758,中华书局,2000。作者原作38864员,殆明细数合计时小误。今从徐规先生校记[56](页770)订正。参阅陈智超《宋史十二讲·宋代阶级结构》,页291,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核心地位。即使从交游角度而论,科举出身者,这占 25%左右的人群也是官员交游的主体。他们通过师生、姻亲、僚友、馆阁、交政等结成一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关系网”。这也是本书重点探索的交游群体之一。

据上引李心传(1167~1244)的记载,嘉定六年(1213)在籍四选官员凡 38 870 人,而南宋人口峰值的数据约出现在嘉定十六年(1223),其户数约为 1 500 万,人口总数约为 9 000 万^①,则官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十万分之四·三二;即使加上约三倍的吏人,官吏总数也仅 15.548 万人,只占当时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七三。如此低的官民之比,却长期被蒙上“冗官冗吏”的恶名,这也是宋代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力证之一。今之公务员占总人口比例,则远高于此。

复次,宋学不仅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②的博大精深,更有融儒释道于一炉的兼容并蓄。宋代的君臣、馆阁名流、文学之士,一般均有较深的佛道二学修养,与高僧、名道结成方外之交者比比皆是。宋初名流杨亿(974~1021)、王禹偁(954~1001),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的领导者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1021~1086),著名文学家苏轼(1036~1101)、黄庭坚(1045~1105)等均有较高的佛学、道学修养。^③南宋的朱熹(1130~1200)、范成大(1126~1193)、周必大(1126~1204)等同样如此。他们各有许多方外之交。而宋释文莹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且与丁谓(966~1037)、欧阳修(1007~1072)、苏舜钦(1008~1048)、刘摯(1030~1097)、郑獬(1022~1072)等广结交游。释契嵩(1007~1072)、惠洪(1071~1128)、居简(1164~1246),不仅擅诗文且熟悉儒家经典,各与当时的士大夫有广泛的交游及唱酬。释智圆(976~1022)则儒释道兼擅,自号中庸子,著述宏富,与林逋(968~1028)等交善。道潜颇富文学才华,与苏、黄、秦观(1050~1100)^④等交往。南宋末名僧道璨(1213~1271)诗文清新脱俗,与张即之(1186~1266)、方逢辰(1221~1291)等交游,与江湖派诗人迭相唱酬,且与日本僧人交往。尤值得一提的是宋初九僧及其与士大夫的交游曾留下风流佳话;而本书第一章卷末详考的宋初杭州昭庆寺主省常(959~1020)广结方外之缘,结净行社,竟罗致士大夫至少 123 人之多,留下名流、贤达入社诗 90 余首;堪与东晋慧远白

① 《南宋农业史》,页 305,人民出版社,2010。

② 《礼记·中庸》第 27 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 35,中华书局,1983。

③ 《范仲淹评传》,页 289~374,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④ 据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卷 1(页 3,中华书局,2002)所考,秦观生于皇祐元年(1049)十二月,公元年号已是 1050 年。今各种工具书、《全宋诗》、《全宋文》小传均括注其 1049 年生,不无小误。

莲社媲美,其规模则更大。净行社不失为充分体现了宋初太宗、真宗倡导的儒释道合流、文化趋同的一个鲜活例证。

白玉蟾(1194~?),为南宋最著名的道学宗师之一。博学,善诗文,工书画,擅作词,是一位全能作家,今传世诗文词约20余卷,不乏佳作,是最能体现儒释道合流的宋代道家。其与儒释道三家交游,及社会芸芸众生之交往,仅见于诗词文赋者,就达近200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令人叹为观止。道士在医药、养生等方面有精湛的研究,这也成为他们与士大夫交游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范仲淹不仅精熟道书,且从道家学得气功以保健养生,不过练得过火,反走火入魔。他与精于篆刻的周德宝及对《易》有精湛研究的屈应元两位道士保持了长期的交往与友谊,另一原因是共同爱好琴艺。范的友人中也不乏嗜道知己,如石延年(994~1041)和同年滕宗谅(991~1047)^①。宋代士大夫的方外之游在本章及以下的章节中还将论及,这里仅作浮光掠影式的概述。宋代知识精英的方外交游同样留下许多传世佳话。

最后,宋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水陆交通的发达,驿递制度的完善,为宋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商业、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史无前例,即使明清时代也罕能与之相匹。其流动人口之广,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各种各样的行会、市集、会社均为宋人交游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鉴于本书主要论述士大夫之交游,故有必要简论民间交游的概况,拟以宋代的行会结社为例。

二 行会结社与宋人交游

关于行的起源,众说纷纭,甚至有主张始于春秋战国说者;笔者却认为杨德泉先生始于隋代说为近真。^②史料显示,隋代洛阳丰都市已有100行或120行^③,西市(隋之利人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根据唐代长安“商贾所凑多归西市”,东市“繁杂少劣于西市”推测,西市之行,不会少于220行,但唐代长安东、西市仅各占二坊之

① 《范仲淹评传》,页320~327,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范仲淹全集》(下简称《范集》)卷2《梦张先生》诗最能明其三教并重之学术趋向:“清静道自生”,“读《易》梦周公”,“养志学浮丘”。李勇先等点校本,页26,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卷1,页283、368,商务印书馆,1959。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页27~28,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刊《宋史研究论文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③ 刘义庆《大业杂记》,《太平御览》卷101引。

地,其行,又称肆,似乎只是商业性的店铺而已。^①而且东、西两市各 120 行,有不少是重复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行呈现了新的特点,一是行会规模扩大,分工更为细密,二是分布地域更为广泛,不仅限于少数大城市,而且遍及全国中小城市。在熙宁八年(1075),不愿纳免行钱“依旧祇应”的东京行户已达 160 余行。至元丰八年(1085),愿纳免行钱者,诸行已有 6 400 余户。东京诸色行户至少达 1.5 万户,约占当地人口的 1/10。行户已从唐代的纯商业发展为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甚至连“杂贩破铁,小贩绳索”等“贫下行人”,提篮挑担、沿街叫卖的走夫贩卒也无不当行。^②正如郑侠所说,实行免行钱法后,“凡十余日之间,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③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有 440 行之多,是书还列举了其中的 140 余行,分工极细。如娱乐业中的歌舞就有“歌舞”“歌琴”“歌棋”“歌乐”“歌唱”5 行,甚至“起鱼鳞”“提茶瓶”也分列为行,极为琐细。是书作者又在《诸行市》条列杭州有:“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绵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花朵市、肉市、米市、卦市,银朱彩色行、金漆卓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处布行、麻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蟹行、鱼行、木行、竹行、果行、笋行”等 30 余行市,这些均为颇具规模的行市。此与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页 282)所列的开封 23 行互有异同。正如吴自牧所说,宋代“行分最多”,宋代的行,剔除其重复者,至少应有 300 余之多,而且遍布全国各地。不仅如成都、长安、苏州、昆山、建康府、明州、嘉兴、福州、无锡等地有各行^④;即如诸路州军县镇坊郭工商户也已普遍投行。宣和(1119~1125)年间,已“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靖康(1126~1127)间罢纳,绍兴十一年(1141)又恢复“量纳免行钱”。嘉定八年(1215),即使是像太平州当涂县黄池镇这样的小镇,也是“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⑤。可见一入行籍,即为终生难脱。所以至迟在明代中期,已有了“三百六十行”之称,出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 8《东市》,卷 10《西市》,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 11,均作长安东市 220 行。但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卷 1 页 346 认为:应是 120 行之讹。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页 95(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标明西市中的 36 行,另有店、铺、肆、商家等凡 13 种名称,多与饮食行当有关。

② 《长编》卷 262,页 6407;卷 308,页 7479;卷 359,页 8592,中华书局,1986。

③ 郑侠《西塘集》卷 1《免行钱事》。

④ 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刊《宋史研究论文集》(一),页 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 64 之 66;《真文忠公文集》卷 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方按:据此状,行首又称“行老”。又,南宋真州扬子县另有一黄池镇。

现“各有市语，不相通用”的情况，其后，“三百六十行”成为市井街坊市民各种谋生行当的总称，其基本范畴仍不出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三大类^①，其滥觞期均可追溯至宋代。

宋代的行会组织，一般认为是为应付官府科差及防止竞争而立。行又称为团，如杭州“城南之花团、泥路之青果团、江下之鲞团、后市街之柑子团”之类，显然，多为商业性团行。手工业性质的行，则又称“作”，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钹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奁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作分”。显然，这里的作，是已具有行业规模和组织的手工工匠的集合。如上所述，行也称为市，如上引《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将行、市并列（市13，行17），这里的行市性质完全相同，称行和市只是约定俗成而已。在别的史料中，肉市、米市，又称肉行、米行；鱼行，也称鱼市，证明其名称有可互换的类似性。以上为名实相符的行，也有异名之行。如“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钱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②在两宋，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行，专门从事职业介绍，“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介绍供雇；是最早的人力资源中介公司。如遇受雇者偷盗东西、逃亡之类，负责会合原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③。此外，还有一些纯服务性的行业，如供水、出粪、盘垃圾等也有行会组织，且划定地分，其他行人不准侵入。还需指出，宋代极为兴旺繁盛的饭食行及酒行，虽“不当行者”，“而借此名”；实质上，“则与当行同也”。^④

行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应付官府的科索，即巧取豪夺。正如苏轼言简意赅地指出：“须索假借，行市为之忧恐。”^⑤即使熙丰变法中推行免行钱法，仍未使这种情况得到根本解决。相反，却使大量原不当行的小商小贩或失去生计，或被迫投行，加重了负担。另一重要作用，则为防止竞争，排斥异己，保持同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和尽可能扩大市场份额。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茶行“兼并之家”。王安石曾对神宗说：

①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委巷丛谈》。参见《中国古代三百六十行》绪论，页1~25，杭州出版社，2008。

② 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永乐大典》卷7603引，吴自牧《梦粱录》卷13《团行》。

③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雇觅人力》，《梦粱录》卷19《雇觅人力》。

④ 《梦粱录》卷13《团行》，周密《武林旧事》卷6《诸市》。其书宋刻本作“布行”，知不足斋本作“布市”，可互相换用，尤为显证。

⑤ 《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

又说“余行户盖皆如此”^①，这些富商豪贾把持行会，利用特权，勾结官府，谋取垄断利润，还把种种不合理负担转嫁给中小行户。“行首”之特权，则远胜今行业协会负责人。

隶名行籍的工商业者称“行人”或“行商”、“行户”，其首领则称“行头”、“行老”或“行首”。^②宋代不同行户，各具不同服色。正如孟元老所述：“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乃至“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③。不同行会，还各有专用市语，不相通用。如世以卖香为业的华亭人黄翁，“每往临安江下收买‘甜头’，‘甜头’者，香行俚语也”。^④这也许正是“行语”一词的由来。不仅如此，甚至通用钱陌也有不同。《东京梦华录》卷3《都市钱陌》载：“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短长使用。”

两宋行会迎神祀祠风气很盛，为本行祈福；还有各种赛会，通过娱乐活动，达到宣传商品、扩大销售的目的，实开近代商品广告之先河。如南宋杭州，每年四月初八，有“诸社朝五显王[庙]庆佛会”。五显神，又称五通神，起源于徽州婺源县，随当地商人贩运木材、茶漆等流传各地，遂不胫而走，成为行商的保护神。连不信鬼神的朱熹对发源于他家乡的五通神也发表了如下评论：“有所谓五通庙，最灵怪，众人捧拥，谓祸福立见。”在江西临川，“水东小民吴二，事五通神甚灵，凡财货之出入、亏赢必先阴告”。其信仰之虔诚，不言而喻。设五通庙最密集之处，为沿京杭大运河从镇江到杭州一段，正与徽商经由水路外运商品的商路紧相吻合。^⑤江南地区祀神风俗尤盛，绍兴“郡人奉诸暨东岳庙甚谨，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帝生朝，合数郡伎术人毕集祠下”，是手工业匠人的神祠。“鄱阳每岁迎神之会，习俗已成……至于酒浆

① 《长编》卷236，页5738，中华书局，1986。

② 宋又称名妓和殿前三班首领为“行首”，即为其衍生义。分见《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和《曾巩集》卷31《再议经费札子》。

③ 《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参见《梦粱录》卷18《民俗》。

④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宛委山堂本《说郛》卷116引。

⑤ 《梦粱录》卷19《社会》，《朱子语类》卷3，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5《吴二孝感》，页667，中华书局，1981。参见[美]韩森《变迁之神》（中译本），页139~14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沃犒其徒，又自随人致力，谓之心愿”。同样是在饶州，“饶民以八月十五日为威惠广祐王生辰，致供三昼夜，及罢散之际，每处各备酒果饮福，伺人静则集会”。在这些活动中，均有行户参与。而在严州，则设有招商神祠一所，因其地“土俭俗贫，假贸迁之利，以粒斯民，故汲汲然”；此所以假“招商为名”之缘由所在。^①在北宋首都开封，“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灌口二郎神，相传为祀秦李冰父子，原在永康军崇德庙，宋代敕封灵惠侯。“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无论贫富必宰羊，一岁至烹四万口。一羊过城，则纳税钱五百，率岁终可得二三万缗。”^②可见其香火之盛之一斑。

南宋行都杭州诸行投献祠神风俗，尤为盛况空前。正如吴自牧所云：“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如祀祖庙在广德军的山神张渤祠，仁宗时封为“灵济王”，徽宗时赐庙额为“广惠”，俗称张王庙。张渤诞日为二月十一日，“其日，都城内外，诣庙献送繁盛……又有七宝行，排列数卓珍异宝器，珠玉殿亭，悉皆精巧”。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诸行铺户，以异果名花，精巧面食呈献者”，“络绎往来，无日无之”；甚至“丐者于吴山行宫献彩画钱幡，张挂殿前，其社尤盛”。其殿下之刘姓佐神，亦大沾其光，香火特盛，“诸社献送，亦复如是”。而杭州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开沽呈样”之日，预作告示，雇用“官私妓女，新丽妆着，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招摇过市，风流少年，“追欢买笑，倍于常时”。取得明显商业广告效应及促销效益。在解州解县盐池，有真武祠，大观元年（1107）二月，赐庙额“广福”^③，成为盐商祀奉的守护神。而皮场庙，则为皮革加工业行会的奉祀神祇，如洪迈所云：“时皮场庙颇著灵响，都人日夜捐施金帛。”^④

总之，两宋期间既有行会共同信奉的守护神，如五显神、张王庙、东岳真君之类，也有某一行业专祠的神祇，如皮场庙、真武庙等。这种香火旺盛，正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写照和折射。在反抗官府对行商压迫勒索及应付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乞灵于神祇的庇祐。宋代民间普遍信仰的紫姑神，原来只是卜箕帚、蚕事的厕

① 《夷坚志》丙志卷17《沈见鬼》，页507。《夷坚志》支癸卷6《舒七不偿酒》，页1268。《广祐王生日》，页1269。景定《严州续志》卷4《祠庙》。

② 《东京梦华录》卷8《崔府君生日神保观神生日》。高承《事物纪原》卷7，《夷坚志》支丁卷6《永康太守》，页1017~1018，中华书局，1981。

③ 《梦粱录》卷1《祠山圣诞》，页7；卷2《三月·佑圣真君诞辰附》，页9。《诸库迎煮》，页12~13；《东岳圣帝诞辰》，页14，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宋会要辑稿》礼20之56。

④ 《夷坚志》甲志卷5《皮场大王》，页39，中华书局，1981。

姑神，是妇女专祠的神祇。到了南宋，升级为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祠。信仰者也不限于年轻妇女，而遍及社会各阶层。《夷坚志》甲志卷16《碧澜堂》载：“南康建昌县民家，事紫姑神甚灵，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贵可贩，或云某处乏米可载以往，必如其言获厚利。”简直成了行商发财致富的佑护女神。又如今已为人们熟知的“妈祖”，实产生于宋代。当时宋代海外贸易极为发达，福建泉州是最著名的港口之一。林夫人神祠在莆田的出现并非偶然。她最早的名称应是“海屿神”，徐兢记载了奉使高丽航海途中遇险的惊心动魄情景：

若遇危险，则发于至诚，虔祈哀恳，无不感应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黄水洋中，三舵并折，而臣适在其中。与同舟之人，断发哀恳，祥光示现，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舵；既易，复倾摇如故，又五昼夜，方达明州定海。^①

这一出生入死的经历，述者刻骨铭心，读者亦无不动容。徐兢出使于宣和六年（1124），但在宣和五年八月，徽宗已赐额莆田县神女祠曰“顺济”；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封“灵惠夫人”，孝宗乾道三年（1167）加封“灵惠昭应崇福夫人”。故俗称“林夫人”。洪迈笔下的林夫人庙，已是地道的航海者的佑护神灵。他写道：“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珥，祈阴护，乃敢行。盖尝有至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洪迈《夷坚志》支志自序称，成于绍熙五年（1194）六月一日，则在南宋中期，已云此庙不知始于何年，可既称“林夫人庙者”，当在高宗封号之后。亦即至迟在南宋初已成为从事海外贸易商人的守护神。南宋后期，这种福建的地方神，逐渐成为“所福遍宇内”的“圣妃庙”；“商贩者不问食货之低昂，惟神之听”。^②

如上所述，宋代的行、团、作、市是同一性质的，指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行业组织，是店铺、作坊的集合，类似于今之同业工会，今人亦称其为行会。但在宋代，会与行则有严格的区别，会与社，性质相近似；但亦有区别，宋人著作中往往会社连用，正与行团并称相类似。

宋代会社风俗之盛，今人叹为观止。会，是一个涵义十分宽泛的概念。凡朋友

①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9《礼成港》。

② 《宋会要辑稿》礼20之61，《夷坚志》支景卷9《林夫人庙》，页950～951；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顺济圣妃庙》引丁伯桂《庙记》记其事甚详。参见[美]韩森《变迁之神》（中译本），页31、页145～14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作者脚注认为，洪迈所记即指徐兢出海事，似未允。

聚会,学术讨论,专题结会等各种形式、名目的集会,莫不称会;民间行香朝献、祠神祷祀之类活动,佛道二教的设醮致祭,乃至文娱、体育等社团组织,也多称会。后者与社几乎是可以置换的同义词,会社连用组合成词也可指学术、宗教、文娱等团体。就词性而言,会、社均可分别作动词、名词使用。用作动词,则有现代意义上的开会、结社等含义。

宋代的会,五花八门,难以尽举。如《二程语录》云:“昨日聚会,大率谈禅”,是指关于释教禅学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宋人姜愚(1010~?),精《论语》,“为一讲会,得钱数百千”^①,则是收费的专题学术演讲会。朱熹女婿黄榦(1152~1221),嘉定十年(1217)集朋旧生徒于福州城南寓居地法云寺,立下《同志规约》,昭告天下学者,每日读经史子书各一,以《论语》、《周易》、《左传》为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定期集会讨论,规定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岁一集。每集各以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②。这是定期举行的大中小型学术研讨会,旨在答疑解惑,教学相长,把朱熹开创的学术民主作风发扬光大,以弘扬闽学。宋代民间聚会极为普遍,如蓝田吕氏兄弟制定的《乡约》中就规定,为检讨《乡约》执行情况,每月或每季聚集邻里乡党由家长参加的聚会,以执行赏罚,修订《乡约》。其具体规定为:“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所费率钱,合当事者主之。”^③可见是轮流举办的有聚餐联谊性质的聚会。

与今茶话会颇相类似的茶会,宋人又称会茶,极为普及,士庶皆备,方外亦时常举行。如宋释希昼《留题承旨宋侍郎林亭》诗,记士人与僧人会茶情景,“会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充满林下野趣。太学生在北宋末的多事之秋,更以茶会的方式,互通信息,指斥时政。“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是同乡联谊性质的茶会。南宋王十朋(1112~1171)还记载了一种茶会上的游戏茶令。其诗云:“搜我肺肠茶著令”(自注:“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命季梁掌之”)。^④刘焯(968~1029)与刘筠(971~1031)在一次茶会上,就点茶进行互对,以“吾与点也”,对“金曰鯨哉”,不仅说明了二人的博学和思路敏捷,而且诙谐幽默,令一座绝倒。^⑤

① 《二程集》页23,中华书局,1981。《邵氏闻见录》卷18,页194,中华书局,1983。

② 黄榦《勉斋集》附录《黄榦年谱》。

③ 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页567,中华书局,1993。

④ 朱彧《萍洲可谈》卷1,页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王十朋全集》卷9《万季梁和诗留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⑤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页6,中华书局,1985。